想要从思想上探寻纳粹现象的读者，会发现战时的第三帝国不会留下太多可供思考的新材料，因为此时的德意志帝国无非是按照已“成形”的理论走向先前一切努力的归宿，一场给世界与自身带来毁灭的战争。犯罪的宣言早已写就，所剩下的工作是实践的最重要一步。不考虑技术突破上的奇迹出现（如原子弹，但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帝国从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军事装备上都找不见打胜这场世界战争的可能（即使选择不主动入侵苏联，美国作为英国的盟友参战似乎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更由于纳粹以工业化的手段系统性地在战争中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反人类恶行，希特勒不会有在“一般”战争下仅仅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可从战争的泥沼中离场的选项（当然希特勒从始至终也无意于此）。

在那些战争前便已在纳粹主义追随者身上表露无疑的特性（如反犹、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外，在战争时期所展现出的最值得注意的新特点，或许是随着战况向失败转向之后，狂热主义的势头反而更为剧烈，整个纳粹政权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对那些被视为第三帝国统治下需要受到特别对待的群体（犹太人、同性恋、战俘等）执行更为残酷的迫害政策。愈是接近毁灭，疯狂愈盛。这可能是为注定失败的战争找寻心理上更远大的合理性，以“净化雅利安民族”的“崇高”使命感来减轻对即将到来的灭亡的不安与恐惧，却是以更多无辜者的鲜血为代价。

吉拉斯曾预言“当这个新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时——这一天是必然要到来的——人类对于它的逝去将比对以往其他阶级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这为苏联解体后的历史所证实。共产主义极权政府迫害曾今的自己人（没有人永远是共产党的自己人），纳粹党人则早早划分了“敌我”；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普世”的，而纳粹主义则基于某一民族；共产主义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内战，纳粹主义则是一个民族与全世界的敌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排他而自成体系，纳粹主义的思想独断但来源却混杂无条理；共产党人在落后的、对工业化充满急切地渴望地国家夺取权力，纳粹党则兴起于现代民族国家遭遇与其他民族的危机之时；共产党以科学的名义散播愚昧，纳粹分子实际上并不在乎科学的原则。上述的这些不完全的对比，解释了为何相较于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纳粹党的政权维持的时间如此之短暂，但共产党失去大众的信仰几乎是永久性的，而纳粹主义却总也不肯真正的死亡，并附着在不同民族的身上死灰复燃。那些摆脱了或未曾经历共产主义极权的国家眼下大抵不必再担心共产主义的灾难卷土重来，纳粹的威胁却从没有完全远离。